

收稿日期:2023-04-03

《陶庵梦忆》中的名量词与数量名结构

杨睿佳,化振红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明末清初时汉语名量词体系基本完备,《陶庵梦忆》中名量词的使用与当时整体情况有所不同。《陶庵梦忆》使用的名量词主要有四类:部分量词为沿用旧词;部分量词为明代新生;部分量词在明代开始泛化,体现了白话文中量词的使用特点;部分量词为半文半白文体独有,同时期白话文献和现代汉语中均未使用。《陶庵梦忆》在数量名结构的使用上,“名+数+量”结构最多,“名+数”结构次之。这是受《陶庵梦忆》半文半白文体特征的影响,且受文言特性的影响远大于受白话特性的影响。

关键词:《陶庵梦忆》;名量词;数量名结构;半文半白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2-008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深加工语料库实践的汉语史分词规范研究”(22BYY108)。

作者简介:杨睿佳(2000—),女,山西忻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化振红(1966—),男,河南洛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汉语史语料库建设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2.023

名量词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学者对名量词断代研究的关注点最初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是名量词断代研究的开创性著作。近年来,名量词研究重心转移到白话文著作涌现的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白话文口语程度高,基本能反映当时语言的日常使用情况,所以,在明清时期名量词研究成果中,学者主要关注白话文中的名量词,如孙欣^[2]、叶桂柳^[3]、闫潇^[4-5]等,而半文半白文献中的名量词尚未有人进行细致分析。《陶庵梦忆》^[6]是明末清初半文半白文体的代表性著作,作为随忆随记的小品文,口语化程度高,但又不失文言特性,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名量词进行描写分析,可以反映明清时期半文半白文体中名量词及数量名结构的使用状况。

一、《陶庵梦忆》中名量词的使用情况

名量词也称物量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单位的词。学者们从性质、功能、来源等角度对名量词作出了不同的分类。明清时期名量词研究的对象多为白话文,关注重点是新生量词及量词词义

泛化,作为半文半白文体的小品文,《陶庵梦忆》与明清时期名量词的整体使用情况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沿用的名量词、新生的名量词、泛化的名量词和半白半文文体独用的名量词。本文绝大部分语料来自《陶庵梦忆》,少量古代汉语语料摘自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二版)和瀚堂典籍数据库,现代汉语语料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CL)。

(一)沿用的名量词

度量词是约定俗成的计量单位,最早出现在殷墟卜辞中,使用时间最长,多从名词直接转化而来或直接借用。度量衡先是以人体器官等自然物为标准,后来逐渐产生了人为的标准物,不同历史时期度量衡器的标准不断变迁,往往大小两制并行不悖^[7]。《陶庵梦忆》中度量衡单位有表示长度的量词“里”和“丈”、表示面积的量词“亩”,以及表示重量的量词“斤”,其发展具有稳定性,只是具体量值至明清时期有所变化。长度量词是用来计量长度的词,如“丈”,十尺为一丈,用来计量深度、长度、高度、宽度等。“丈”作为度量单位在商周时期就已使用,根据尺的标准变化而不同,至明清时一般通行大尺,一尺大约30至32厘米,一丈的具体量值大概3米多,一直沿用至今。“亩”用来计量土地面积的大小,最初百步为一亩。《说文句读·田郭》:“六尺为步,步百为亩。”所以,尺的长短、步的大小,以及每亩包含的步数多少,共同决定亩积。明清时期沿用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标准。重量量词用来称量人或事物的重量,常用的是“斤”和“两”。“斤”本义为木工工具。《说文解字·斤部》:“斤,斫木也。”甲骨文字形像斧头一般锋利的器物,用来砍木。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以“斤”量重的用法,汉代《小尔雅》注“二锊四两谓之斤”曰“六两为锊”,所以,一斤为十六两,这一标准至明清未有变化。

量词“股”在文中指称气体,沿用了元代的用法。

有言孝陵上黑气一股。(卷一《钟山》)

“股”,本义是大腿,《说文解字·肉部》:“股,髀也。”后指称包括小腿在内的整条腿,具有长条状的语义特征。长条状的语义特征凸显,开始出现量词的用法,属于成形量词。“股”虚化为量词的用法始见于刘熙《释名疏证》“又以一股麻”,但是用例很少,至宋元时代,其量词义使用频率增多,多搭配“线”和“水”等名词使用,这些名词都具有长条状特征。到了元代,“股”的量词义已经泛化,可以计量气体、气味等无形的具体事物和精神力量等抽象事物,如《关汉卿戏剧集·裴度还带》:“王员外见你那浩然一股鸿鹄志。”“股”的泛化动因是隐喻:气体、气味之类从认知上看都是细长型的,因而可以用“股”来计量,《陶庵梦忆》沿用了“股”的这种用法,如“黑气一股”中的“股”;现代汉语中多用“股”来计量与人相关的力量、劲头、精神等抽象事物,实际上在说“一股力量、一股劲头、一股精神、一股魅力”的时候,认知中会出现细长的形状。这两者都和“股”原型范畴具有形状上的相似性,因此是隐喻的促动导致了范畴的扩展^[8]。

(二)新生的名量词

“棵”为明代新生量词,在书中都用来计量松树的数目。如:

上植果子松数棵。(卷五《于园》)

“棵”是“椀”的俗字,俗字是相对于正体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9]。《说文·木部》:“椀,榘,木薪也。”段玉裁注:“椀之言完也。”“椀”,本义即是完整之木,引申为枝,《广雅·释木》:“椀,支也。”“椀”,多音多义,仅《集韵》收六音六义。王念孙《广雅疏证》卷第十上:“椀,曹宪音缓,各本讹作‘椀’,今订正。《集韵》《类篇》:‘椀,胡昆切’,引此云‘椀,枝也’。遍考诸书,无以‘椀’为‘枝’者,‘支’字未审何字之误。”“椀”的构件“完”为“完”的异体,《干禄字书·平声》:“完,上俗下正。”《龙龕手鑑·土部》

“坵”为“坵”的异体,因此,以“完”为构件的字可俗写成以“兗”为构件的字。王氏考遍古书,不知“支”为何字之误,实则“支”与“枝”古代通用。抄本《新修本草·诃梨勒》:“树似木梘,花白,子形似支子。”“支子”多作“梘子”,支,通“梘”。《药种抄》引《唐本注》:“(诃梨勒)树似木梘。”木梘即木梘,所以,“梘”音为胡昆切时,义为“支”,即“枝”,通“梘”,“梘”为“梘”的俗写形式^[10]。“棵”当从“枝”的意义发展出量词义,用于计量植物数目,主要计量大型树木,后逐渐成为只计量植株的专职量词。“棵”是明代新生名量词,在宋元笔记、元曲和元代撰写的正史中,均未发现“棵”作为量词的用法。在“棵”出现以前,一般用“科”来计量植物。《说文解字·禾部》:“科,程也。从禾,斗声。斗者,量也。”《说文·禾部》:“程,程品也。”段玉裁注:“品者,众庶也。”《广雅·释言》:“科,品也。”“科”的本义为品类、等级,在魏晋时期成为“专门表示分科分品的量词”^[1146]。引申为植物的根茎,《广雅·释诂》:“科,本也。”又引申为用于计量植物的量词,魏晋始有此种用法,《齐民要术·种谷》:“凡五谷,唯小锄为良。良田,率一尺为一科。”“科”在唐代又用来指称科举考试的科目,元代依然有这种用法,可计量植物数、科举科目、品类。明代用同音的“棵”替代“科”来计量植物,分担了“科”的职能,“科”现在只用来指称科考、品类等,不再指称植物的数量^{[3]135-137}。

“台”在明代开始虚化为量词。

土人于其外搭棚演戏四五台,婆婆乐神。(卷一《天台牡丹》)

“台”的本义是高而平的建筑物,《说文解字·至部》:“台,观四方而高者。从至、从之、从高省。与室屋同义。”由本义逐渐虚化为量词,属于过程量词。“台”用来计量戏曲的数目,是用表示地点的词计量在这一地点上持续一定时间的活动,戏曲在高台上表演,所以,用演员脚下的高台来计量他们表演的戏剧。“台”虚化为量词是在明清之际,明清是中国戏曲继元代杂剧后的又一黄金时期,戏曲剧本大量涌现,戏曲理论渐趋完善,宫廷民间常搭台唱戏作为娱乐。这些外在因素促使“台”虚化为计量戏曲活动的量词。在现代汉语中,“台”的计量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能计量戏剧,还能计量仪器、电器和车辆,如“一台电视机”“一台洗衣机”,这是因为现代的家用电器一般放置在桌上或类似桌子的台面上,一些大型家电放在地面上,而地面可看作一个平台,所以,这些电器可以使用“台”来计量。

(三)泛化的名量词

“块”的量词义在明代开始泛化。

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砌而成。(卷一《报恩塔》)

然彼皆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卷五《扬州清明》)

“块”,本义是土块,由本义虚化为量词,用于计量土块,在汉代已出现此种用法。发展至明代,可以计量包括土块在内的块状物和团状物,语义特征是具有一定厚度、体积可大可小,量词义发生泛化。例中的“琉璃砖”有一定厚度,并且形状大小固定,所以用“块”来计量;例中的“团簇一块”是指《清明上河图》里的景物团团拥簇,也具有团状的特征。两例中“块”的量词义已发生泛化。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块”还可以计量人,如:四川成都话中表达远处有一个人,常用“块”来计量,即“那儿有块人”;如果有很多人,就说“那儿有几块人”。但这种用法中“块”之前一般不出具体数词,只有在对话当中,对方询问“那儿有几块人?”时,才用具体数词回答。“块”在方言中可以计量人,是因为从远处看人,人呈团块状。

(四)独用的名量词

“粒”在文中为修辞用法,只在本书中出现。

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卷三《湖心亭看雪》)

“粒”，本义是米粒，《说文解字·米部》：“粒，糗也。”“糗，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由本义引申为粒状物，后逐渐虚化为量词，属于成形量词中的形状型量词。形状型量词是由名词虚化而来，着眼于事物的外部特征，用这类量词去计量一类事物时，量词的语义特征和这类事物的形状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可能是大小相似，也可能是形状相似。“粒”用来计量圆形颗粒状物体的用法在先秦和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尚不存在，直至魏晋时期，“粒”的量词义通过隐喻式的泛化才开始普遍使用，元代的使用范围没有变化。明清时，量词“粒”的计量对象有所发展，包括人体、动物等，如眼珠、痣、蚂蚁^[11]。《陶庵梦忆》中“粒”不仅可以计量事物，还可以计量人。“舟中人两三粒”中的“粒”为修辞用法，用“两三粒”计量“舟中人”，突出人影之小。这种用法只在本书中出现过，虽为比喻用法，但其计量对象仍具有圆形、固体状、微小的语义特征，“粒”所计量的“舟中人”属于隐喻式的泛化。所以，《陶庵梦忆》中量词“粒”是明清时期的发展用法。

用来计量猛兽和鱼类的“头”，一般只出现在半文半白文体中。

乃瀕溪为壑，系巨鱼数十头。(卷二《岫嵎山房》)

以五色火漆塑狮、象、橐驼之属百余头。(卷二《鲁藩烟火》)

“头”，本义是脑袋，即人或动物身体最上方的部位。《说文解字·页部》：“头，首也。”“头”的量词义是由动物的头部虚化而来，所以能计量动物，汉代已有这种用法，一般用来计量与人们关系密切的牛、羊、猪等体型较大的动物，但对人们具有威胁的虎、狮、豹等却不用“头”来计量。这与人们的认知心理有关，虎、狮、豹在当时对人类的威胁很大，人们希望能够征服它们，所以，对它们的计量不用“头”，而选用计量小型动物的量词“只”^[12]。但《陶庵梦忆》却用“头”计量对人极具威胁性的大型动物，这在明清仍很少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头”除了可以计量牛、羊、猪等兽类，还可以计量一般昆虫类，但这种用法逐渐被淘汰。“头”还可以计量鱼类，《陶庵梦忆》用“头”计量巨鱼，此种用法在明代并不多见，主要出现在文言色彩浓厚的官修医书《普济方卷》和《医方类聚》等中，往往称“鲫鱼一头”“大鲤鱼一头”，亦称“大鲫鱼一条”“鳝鱼一条”。体型较大的鱼可以用“头”或“条”计量，二者的使用界限不分明。用“条”计量鱼类的用法在明代以前甚少，仅有几条，如：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中“灸鲤鱼一条”，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又方大鳝鱼一条”。发展至现代汉语，不论体型大小，多用“条”计量鱼类。

“本”，本义是草木的根，《说文解字·木部》：“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由本义引申出两种不同的量词义，一种演变趋势是本义间接引申为“本源”，到了南北朝时，量词义泛化，可以用来计量书籍，因为传抄的书籍有所“本”，所以量书的“本”就是间接地由“本源”义虚化得来，这种用法一直保留至现代汉语。如：

厚如砖块者三百余本。(卷六《韵山》)

另一种由本义直接虚化为量词，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此种用法，《荀子·富国》：“然后瓜桃李一本数以盆鼓。”“本”用来计量草木的数量，如：

青帝喜其勤，近产芝三本。(卷一《金乳生草花》)

名量词“棵”在明代的频繁使用，使同一语义场的“本”的使用开始减少，计量植株的用法只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文献中有所保留。

从《陶庵梦忆》名量词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它一方面保留了文言用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出现的白话用法，新旧用法共存，这是半文半白文体的特有现象，与明清整体使用情况有所不同。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及文学语言的创造性使用是名量词出现以上变化的内在动因。此后，随

着名量词的数量逐渐增多,用法更加灵活,其性质可能还会发生其他变化。

二、《陶庵梦忆》中的数量名结构

量词一般要和数词结合构成数量范畴,再与名词结合构成数量名结构,即数量短语,共同充当句法成分。数量短语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数量范畴与名词组成的名词性数量短语,另一类是由数量范畴与动词组成的动词性数量短语。由于名量词使用时间长、演变方式繁复,名词性数量短语比动词性数量短语更为丰富且复杂。名词性数量短语有“名+数”“数+名”“名+数+量”“数+量+名”四种数量名结构,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名词性数量短语的优势语序发生着缓慢而明确的变化:“名+数+量”结构是最早产生的,各个时期的使用情况基本保持稳定,直至明清仍旧存在;“名+数”和“数+名”结构在先秦时期频繁使用,但在后世逐渐消失;随着汉语语法系统的演变,名词逐渐移位至数量范畴后,“数+量+名”变为优势语序,从先秦至明清,逐渐发展成为数量名结构的重要格式。这四种主要结构在各个时期发挥着不同的功用,存在共用现象。

(一)《陶庵梦忆》数量名结构的基本面貌

从明清至现代,白话文中的“数+量+名”结构所占比重激增,成为数量名结构最主要的表达方式;“数+名”结构的使用频率次于“数+量+名”;“名+数”格式几近消亡,在明清时期的白话文中少见;“名+数+量”格式的使用频率在各个朝代的文献中保持在2%—9%之间^[13]。《陶庵梦忆》中,数量名结构用例达133次之多,“名+数+量”结构使用最为频繁,其次是“数+名”结构,再次是“名+数”结构,“数+量+名”结构出现次数最少。

1. “名+数+量”结构

“名+数+量”格式在商周时代金文中出现频率占四种数量名结构的一半,是当时的优势语序。春秋时期的“名+数+量”格式使用频率骤然下降,并且在随后各个历史时期总体保持稳定,在不同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占比有所浮动。总的来说,该格式是四种数量名结构中最早产生且最为稳定的一种^[13]。直到明末清初,这种格式仍然没有退出数量名结构类型的舞台。但在《陶庵梦忆》中,“名+数+量”格式出现的次数最多,占书中数量名结构总数一半之多,数词大多是“一、二、三、百、数”,而且几乎所有的“名+数+量”格式前面会出现动词。如:

毁屋三十余间,开土壤二十余亩。(卷三《龙喷池》)
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砌而成。(卷一《报恩塔》)

前一例中动词“毁”则直接出现。后一例省略动词“用”,应该理解为“一个金身佛像是用十几块琉璃砖拼凑连接而成的”。

2. “数+名”结构

春秋战国时期,“数+名”格式出现的频率占数量名结构总量一半以上,是优势语序。此后至宋代,“数+名”格式的使用频率逐渐呈下降趋势;到了元代,仅占数量名结构总数的五分之一^[13]。《陶庵梦忆》中的“数+名”格式出现34次,约占所有数量名结构的四分之一。“数+名”格式与“名+数+量”格式有着相同的句法环境,“数+名”格式前可以直接显现动词,动词也可以省略,且数词较小。如:

暖阁上一几。(卷一《钟山》)
列二交椅。(卷一《钟山》)

前一例中“一几”前可根据语境补充出动词,“一几”理解为“(放着)一几”。后一例动词“列”则是直接显现的。

3. “名+数”结构

商周金铭文中“名+数”格式所占比重为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名+数+量”格式,春秋时期急剧下降至3%左右;汉代以后,“名+数”格式逐渐消失,明清时的白话文献中未发现该格式的使用^[13]。而《陶庵梦忆》中“名+数”格式使用18次,占全文数量名结构总数的十分之一。此格式中的数词一般为“一、二、三”,数目较小。在书中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动词后面跟着多个“名+数”格式的并列组合,用来强调名词。如:

陈铜炉一、小箸瓶二、杯棬二。(卷一《钟山》)

动词是“陈”,动词后的“铜炉一、小箸瓶二、杯棬二”是三个“名+数”结构的并列组合形式。

4. “数+量+名”结构

在先秦时代有数词和容量量词放在名词前的情况,如“今之为仁者,犹且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孟子·告子上》),但用例极少;到了汉代,不但数词和容量单位词可以放在名词之前,度量衡量词和天然量词也都可以放在名词之前,如“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但出现次数依旧很少;宋代所占比重达五分之一;元代时,此格式迅速发展,所占比重激增至五分之三以上,成为数量名结构中的主要表达方式。明清至现代,“数+量+名”格式继续发展,成为优势语序^[13]。但《陶庵梦忆》中此结构只出现5次。分别为:

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卷六《彭天锡串戏》)

收掌付双荷叶,能月继三石米,致二斗酒。(卷六《水浒牌》)

少年作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卷六《噱社》)

曾以一出戏,延其人至家。(卷六《彭天锡串戏》)

以片铁日夕磨之。(卷二《沈梅冈》)

例中的“一杯好茶”“三石米”“二斗酒”“一篇现成文字”“一出戏”均是“数+量+名”结构,其中,“片铁”省略了数词,这种结构省略的数词往往是“一”。这种结构出现的语言环境具有现代汉语白话文特点。

汉语数量名结构的语序类型丰富,如果没有名量词,汉语将只存在“数+名”和“名+数”两种结构类型。这四种类型中,“数+名”和“名+数”结构发展到明清几乎不再使用,一般只在仿古的文学作品中出现,“数+量+名”格式已经成为数量名结构中的优势语序类型。而在半文半白的小品文《陶庵梦忆》中,数量名结构各类型的使用频率异于明清时的整体使用情况,“名+数+量”结构使用次数居多,“数+名”“名+数”结构依旧存在,这是由其文言特性决定的;“数+量+名”结构有所使用,且出现在口语特征较强的语境中。

(二)《陶庵梦忆》数量名结构的使用特点

名量词的出现对汉语数量名结构的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展不仅是语言自身不断完善的结果,也与社会发展有一定联系。从人类的认知过程来看,人们对具体事物和数的认识要早于对抽象概念“量”的认识,汉语中的名量词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丰富的过程。在数量名结构中,“数+名”和“名+数”结构只具有计数功能,“名+数+量”和“数+量+名”结构则具有计数和计量双重功能^[14]。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的计量需求不断增加,前两种结构逐渐被淘汰,最终

形成了现代汉语以“数十量十名”为主、“名十数十量”为辅的语序类型。

“数十量十名”和“名十数十量”格式共存近三千年,这两种结构的语法关系和语义重心不同,“数十量十名”是偏正结构,侧重于突出事物,语义重心在名词上;“名十数十量”是主谓结构兼偏正结构,突出事物的数量多少,语义重心在量词上。所以,这两种结构才能在汉语中长期并存,形成互补关系。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语言交际,语序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名词的位置由数量范畴之前变为数量范畴之后,顺应了汉语语法系统的演变。在甲骨文中,名词短语中的修饰语除数量范畴外,全是置于名词前的。金文中修饰语位于中心语之前,没有例外。从上古汉语开始,汉语语法一直以“修饰语+中心语”作为优势结构,这种结构对表示数量关系的结构产生类推作用^[15]。在“名十数十量”结构中,名词是中心语,数量范畴是修饰成分,修饰成分处在中心语之后,显然不符合汉语“修饰语+中心语”的优势结构,所以,在类推作用的影响下,数量词组逐渐移到名词之前。类推只是一种演变方式,类推的深层原因是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社会需要。如果从语法结构的角度分析“数十量十名”格式和“名十数十量”格式,前一种为偏正结构,而后一种既可以分析为主谓结构,也可以分析为偏正结构,一种结构的两种理解势必会影响到语言的区别性和明晰性^[16],最终“名十数十量”格式被淘汰,而更加符合语法规则的“数十量十名”结构逐渐取得了胜利,成为了汉语数量名结构的主要语序类型。作为明清时期半文半白文体的代表性文献,《陶庵梦忆》使用“名十数十量”格式的频率较高,这是由其文言特性决定的,使用“数十量十名”格式很少,且出现在口语色彩较强的语境中,可见,明清时期半文半白文体中,量词及数量名结构的使用受文言特性的影响远大于受口语特征的影响,这种现象与其文体特征有着很大联系。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时汉语名量词体系基本完备,《陶庵梦忆》中名量词的使用与当时整体情况有所不同。《陶庵梦忆》使用的名量词主要有四类:部分量词为沿用旧词,如“里”“丈”“亩”“斤”“两”等;部分量词为明代新生,如“棵”“台”;部分量词在明代开始泛化,体现了白话文中量词的使用特点,如“块”;部分量词为半文半白文体独有,同时期白话文献和现代汉语中均未使用,如计量人数的“粒”、计量植株的“本”、计量猛兽和鱼类的“头”。《陶庵梦忆》在数量名结构的使用上,“名十数十量”结构最多,“名十数”结构次之。这是受《陶庵梦忆》半文半白文体特征的影响,且受文言特性的影响远大于受白话特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名量词及数量名结构的发展演变时,不仅要以白话文体为研究对象,更要关注《陶庵梦忆》这类半文半白文体中的使用情况,如此方可准确地反映明清时期名量词及数量名结构的实际面貌。

参考文献

- [1]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孙欣. 明代四大传奇量词研究[D].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4.
- [3] 叶桂柳.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M]. 长沙:岳麓书社,2008.
- [4] 闫潇. 明代白话小说量词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20.
- [5] 闫潇,李建平. 明代新兴量词的辞书学价值[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6):9-13.
- [6] 张岱. 陶庵梦忆[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7] 吴慧. 中国度量衡史的几个问题[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87-96.
- [8] 宗守云. 从“段”和“股”的泛化看量词泛化的一般途径[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7(6):68-71.
- [9] 周玉波. 民歌唱本中俗字的成因及其价值[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3):79-89.
- [10] 周阳. 本草文献椀、榼、椀、椀异文考证:兼论辞书中“椀”的音义问题[J].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1(2):

187-195.

- [11] 陈晓丽. 量词“颗、粒、枚”的认知语义特点[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1): 41-43.
- [12] 叶桂彬. 量词“头”的历时考察及其他称量动物的量词[J]. 古汉语研究, 2002(2): 68-73.
- [13] 黄平. 汉语数量名结构语序类型研究[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5(9): 78-79.
- [14] 吴福祥, 冯胜利, 黄正德. 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J]. 中国语文, 2006(5): 387-400.
- [15] 管燮初. 西周金文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6] 张延俊. 也论汉语“数量名”形式的产生[J]. 古汉语研究, 2002(2): 26-9.

The Noun Classifiers and Quantifiers Structure in *Tao An Meng Yi*

YANG Ruijia, HUA Zhen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Tao An Meng Yi* is the name of the book, which consists of eight volumes of essays written by Zhang Dai (1597-1689)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In that period, the system of Chinese noun classifiers has become basically complete. However, the usage of these words in the book differs from that in the contemporary works.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noun classifiers used in *Tao An Meng Yi*: conventional words; coinages in Ming Dynasty, vernacular words, semi-classical and semi-vernacular words which are absent in the contemporary vernacular and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quantifiers structure in Zhang's book, the structure of "noun + number words + measure words" is prevalent, followed by the structure of "noun + number words". That is attributed to its prominent semi-classical and less influential semi-vernacular text style.

Key words: *Tao An Meng Yi*; noun classifiers; quantifiers structure; semi-classical and semi-vernacular; stylistic feature

〔责任编辑:何敏敏〕